

南昌航空大学学术文库



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

连振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昌航空大学学术文库

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

连振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 / 连振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161 - 4983 - 6

I. ①锡… II. ①连… III. ①锡良(1853 ~ 1917) — 人物研究②政治制度史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①K827 = 52②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182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清末满蒙督抚中，锡良算得上得力、能干的。原本思想趋近传统的他，在时代大格局的感召下，一变从新，不仅支持改革、立宪，甚或领衔敦请清政府提前召开国会、确立内阁，在清末数年出尽风头、颇显作为。

锡良生前死后博取不少赞誉，但对这一人物，始终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锡良奏稿》等资料的出版，推动了真正学术性研究成果的出现。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陆续发表了十几篇论文、撰写了若干硕士学位论文，视野涉及到锡良的学堂教育理念、经济改革、铁路建设等方面，展现的空间多集中于四川和东三省两个区域，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不过，这些仍然不足以涵盖锡良丰富的从政经历以及在清末诸多新政改革举措。如果联系到清末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局，联系到地方与中央的种种矛盾和争斗，联系到关键性人物在历史作用，联系到蒙族督抚锡良的历史角色，特别是联系到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大批的锡良个人档案和其他未刊文献资料，对他的研究依然远远不够，依然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连振斌的专著《锡良与清末新政》是在他博士论文《锡良与清末改革》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迄今为止，这是一部研究锡良分量较重，涉及面较广，论述相对深入，利用档案材料最多的学术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学界对这一人物研究的不足。

从他的研究来看，有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连振斌的研究是清末满蒙权贵研究大课题中的一环。

以往学术界对清末政治的关切往往以辛亥革命、革命党为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学术创新,视点拓展到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个别重要的统治阶级历史人物(如慈禧、奕訢等),但学者依然无意或很少思考体制内各集团的亲疏远近、利益纷争、权力派系、成败得失。对失败阶级特别是旗籍权贵,更是成见颇深,笼统视为“昏聩无能”之辈。近年来情况所改观。

我以为,对体制内的核心层做更为细致地甄别、梳理与研究十分必要。清王朝施行的是满蒙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民族的专制政治统治。在统治阶级结构中,由于满族的特殊地位以及满蒙保有世代联姻的特殊关系,遂确立了满蒙权贵的权力轴心。尽管通过科举制度,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佼佼者得以进入统治集团,甚或担任高官,掌控实权,但始终居于权力圈的外围。重大而带有根本性的决策他们往往不能染指甚至不得与闻。有清二百多年,这样的权力格局始终强而有力。晚清时期,随着清王朝打开国门面向世界,随着各种矛盾的深化,数百年行之有效的内外官制、满汉权力格局发生不小的变化。伴随着中央权力的下移,汉族督抚权力,汉族高官对权力核心的影响力大为增加。这些态势,或多或少引发满蒙权贵的不安。于是,满蒙权贵对“家事”的看顾,对权力的掌控,对汉族高官的戒备之心潜滋暗长。至清末,旨在“控权”的自主性的改革更是若隐若显。诚然,统治阶级是作为整体施行专制统治的,但是,整体中的核心层的所思所想与非核心在利益层面、心理层面乃至对改革的方向性把握并非完全一致。如果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族群关系考虑进去,这种不一致确实存在,有时候甚或十分尖锐深刻。之于少数民族施行统治的王朝,这种问题更是格外凸显。过去的研究,总是统而言之,一概而论,很少去区分他们的真正关切点。我们恰恰想在统治集团整体中,把那个存有“满汉芥蒂”、在整体利益与核心利益中追求满蒙利益最大化、处理各种矛盾格外“谨慎”的一群人——满蒙权贵利益集团分割出来,研究他们的所思所想,研究他们的出处行藏,研究他们的政策制订,期冀对历史的特殊性、复杂性、矛盾性,甚至某种“乖离”有更真切的理解。时至清末,在越来越融进世界之时,满蒙权贵的变化较之清前期更为复杂。不仅出现了一批思想与举措趋新的满蒙权贵利益群体,还形成了一批致力于新知新政的旗籍督抚。他们活跃在清末十年的政治舞台上。以失败阶级、成王败寇式的研究代替具

体分析，把他们统统归入“不识时务”“冥顽不灵”之辈，把复杂的历史现象作脸谱式、简单化的描述，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

有鉴于此，数年来，我们致力于研究满蒙权贵集团。我们想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对他们的“决策失误”负责。显而易见，易代之时，没有哪个统治者甘于失败，甘愿拱手交出政权。因之败亡之时他们的种种拼死抗争绝对可以想象。那么，已经保有268年王朝统治的满蒙权贵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当革命大潮成排天巨浪，他们是有心无力还是束手就擒呢？我想，把这一时期满蒙王公，满蒙督抚或群体或个人做深入的研究，会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如果他们果真都是草包，那革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们中的一部分还说得上有勇有谋，那辛亥革命成功的意义将更加深远，更难能可贵。

在这个意义上，锡良的研究就不是孤立的人物研究，而是对一个阵营观察的一个切口。

其次，连振斌的研究相对系统。

以往的锡良研究很少挖掘他的早期家世与早年经历。连振斌利用档案资料，系统整理了锡良家族图谱和基层逐级而上的从政经历。这些梳理可以使我们对后期成为能臣良吏的必然有所理解。他的博士论文附录部分曾经完整地编排了锡良的家谱世系、年谱简编，但由于出版社篇幅的限制，这些内容被遗憾地删去了。将来有机会将以其他方式呈现给读者。

再次，连振斌的研究以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料见长。

连振斌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起码两年以上的工作时间是在图书馆渡过的，八小时之外，也是在教室、宿舍誊写，爬梳档案资料。我确切知道，两年里他风雨无阻，四处出击，细大不捐，翻阅查找各种文献档案。北京的各大学、各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时常可见他的身影。就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来说，就几乎被他“踏破”门槛。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里存各种锡良档案与未刊资料，不仅完整，还十分“隐蔽”。这些资料被他“一网打尽”，或者说几乎收罗殆尽（连振斌性格平和沉稳，颇具人缘。在他的真诚感染下，近代史所图书馆的老师特别为他“开辟”了“绿色通道”，从而有了一定“特权”。于是一些从未开放的档案被他“荣幸地占有”了）。基于此，档案资料的丰富成为

这部著作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连振斌极其勤奋努力。他的博士论文六易其稿，每一稿都有明显的进步，都有跨越式变化。正是因为有这些努力，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位论文升格为学术著作。

人无完人，研究工作更不能一蹴而就，只能不断完善，不断深入。特别是发现了新的材料或者在理论的指引下萌发了新的认知。之于连振斌的著作，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拘泥于事功，无法站在清末大舞台的高度评判这一人物，是连振斌研究的弱项。概因他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生一路走来，基本属于“少不更事”。之于他，别说官场如此“陌生”，就连社会也不很熟悉。尽管他在结语里尽可能横向比较了同时代的张之洞、那桐、端方等，但如何就锡良与他的精神世界、锡良与时代潮流，是时势作育了后期的“激进”，还是他的思想经由新知有了大的改观，这些皆大有思考的余地。再，晚清官场是如何运作的？官僚群体因何结为派系，关系如何？汉族督抚与满蒙督抚的关系、亲疏远近是怎样的？他交游的朋友圈又是如何影响他的？这些依然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近年来，研究者的学术旨趣往往热衷于研究群体，对人物个体的研究多少有些偏见。我觉得，在多数时候、多数情况下，督抚的群体研究意义比较重大。但是，在他们任职的时间长短不一、任职区域各不相同的前提之下，个体、个案的研究价值相当重要。因为不少时候分散各地的督抚没有多少共性可言，换一句话是在具体问题上——比方说内幕、矛盾利害的双方、利益关系的千差万别等方面——各不相同，那么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时候特殊往往超过共性。这些年，不少学者于博士论文选人物，特别是个体颇不以为意，往往讥之为“至多是人物传记”。我常不以为然。晚清文献浩如烟海，研究者面对如许资料每每坐困书城，无从下手。固然，着眼于一个大体相近的群体，能诠释更大的意义。但不对辖区的特色、人物的性格、带有强烈特殊性的事件做个案分析，如何说得准确合理？若我们连个体都尚未捋出头绪，如何更合理地认识群体呢？这一段文字在另一个场合发表过（《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这里基本照搬是因为对连振斌锡良的研究就

有如是言，我当时坚持，现在依然坚持。

《锡良与清末新政》的正式出版实在可喜可贺。作为他的导师，理当写几句勉励的话，鼓励他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拉杂写来，权且为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孙燕京

写于京城朝阳袖手斋

2014年5月28日

目 录

绪论	(1)
一 锡良其人	(2)
二 研究现状	(4)
三 研究思路	(10)
第一章 锡良及其时代	(12)
第一节 出身寒素	(12)
第二节 “在晋二十年”	(16)
一 崛起于赈务	(16)
二 “不易得之真才”	(21)
第三节 追随李秉衡	(23)
一 借调烟台	(24)
二 曹州教案	(24)
第四节 戊戌—庚子之际的抉择	(29)
一 戊戌维新中的保守倾向	(30)
二 庚子勤王的观望者	(34)
三 晋东保卫战中的强硬姿态	(42)
本章小结	(56)
第二章 从自办铁路到借债造路——锡良的铁路思想及实践	(58)
第一节 川汉铁路的创设和筹办	(58)
一 川汉铁路自办的提出	(58)

二 川汉铁路之交涉	(60)
三 川汉铁路资金的筹措	(65)
第二节 力保云南铁路利权	(69)
一 筹划滇蜀腾越铁路	(69)
二 赎回滇越铁路	(71)
第三节 锦璜铁路计划	(75)
一 安奉铁路交涉	(75)
二 锦璜铁路计划的提出	(84)
三 以联英美为核心的借款交涉及其失败	(93)
本章小结	(102)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新式教育的推行	(104)
第一节 建立学堂教育体系	(104)
一 创办河南大学堂	(105)
二 改革四川教育体系	(107)
三 调整和深化云南、奉天教育	(112)
第二节 重视实业教育	(115)
一 专门人才的培养	(115)
二 注重兵学	(117)
三 注重留学教育	(119)
四 实业教育	(121)
第三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	(122)
本章小结	(125)
 第四章 官制改革与宪政大讨论(上)	(127)
第一节 裁撤河东河道总督	(127)
一 考察河道总督	(128)
二 变革河工事务的提出	(130)
三 变通河工方案的实施	(135)
第二节 盐政集权与分权之争	(137)
一 收回盐权的提出	(138)

二 中央与地方之博弈	(140)
第三节 厉行禁烟	(159)
一 禁烟思想	(160)
二 禁烟举措及其成效	(162)
 第五章 官制改革与宪政大讨论(下)	(172)
第一节 变通奉天旗制	(172)
一 改旗务司为旗制处	(172)
二 变通旗制的实践	(173)
第二节 清末立宪运动	(180)
一 借款造路论的提出	(181)
二 借债造路救国论与速立阁会救国之争	(187)
三 东三省请愿运动	(205)
本章小结	(224)
 结语	(227)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6)

绪 论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1901—1911），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社会变化剧烈，变革已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共识。然而，中国社会究竟向何方去？这一关系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时代命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这三股活跃清末政坛的势力作出了不同的解答。其中清政府推行了新政（即“清末新政”），作为其自我挽救的重要举措，对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影响很大。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新政”是一个学术的概念，是历史学家对清末十年改革的指称。对此，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就把 1901—1905 年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并不包括 1905 年以后的“预备立宪”。但现在学术界已基本认同这是清末新政所包含的两个不相关联并有着逻辑发展的阶段。据此，笔者认为清末新政是 20 世纪初年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推行的各项改革的指称，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改革的主体是清政府，其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因而具有某种近代的意义。^①然而，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而清末新政则作为历史的背景和配角提及，甚至当作革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学术界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清末新政的研究逐渐步入理性化、实证化的阶段。近年来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但与

^① 本处笔者借用了李细珠先生的著作《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的说法。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这一方向仍显薄弱,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自太平天国军兴,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势力日渐扩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汉族官僚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甚至是清末政治的全部,故而对满蒙人物的研究相对薄弱。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满蒙人物对晚清政治的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清末,时人就称“由庚子至辛亥,乃项城与亲贵之时代”。^①这一方面显示了以袁世凯等为代表的汉族势力日渐膨胀,试图挑战满蒙权贵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满蒙亲贵在清末的活跃,彰显了满蒙人物在清末的重要地位。目前学界对于满蒙权贵的个案虽已取得了部分成绩,但是对于当时如此活跃的团体而言,这样的研究成果显得颇不相称。

至于为何出现这样的状况,这应该与长期以来学界形成的刻板印象有关。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将满蒙群体不加区别地描述为昏聩无能、误国误民的一群人。这样的描述显然过于概念化、简单化,且对于长期活跃于清代政坛的满蒙权贵而言可以说是有些不公平的。事实上,近年以来的史学研究已然开始关注到部分清末的满蒙权贵,如慈禧、奕訢、端方、那桐等人物。^②然而,这些人物多为满族权贵,所以这还不能反映出满蒙权贵的全貌。因此,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掘。故笔者拟以蒙古族权贵锡良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蒙古族权贵在清末新政时期是如何思考、对待和办理新政,以揭示满蒙权贵在新政时期的所作、所为、所思。

一 锡良其人

锡良,字清弼,号梦如,晚号止斋,姓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③

①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0页。

② 如有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闫长丽《培元气而固邦本——端方与清末改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周福振《清末肃亲王善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③ 杜春和:《锡良》,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第七卷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咸丰二年（1852）生。他自幼勤学，21岁即中进士，无疑是少年得志。后签分山西，在山西任官近20年，所到之处“皆有惠政”^①，张之洞目为“循吏第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经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调参与山东区域协防日军北上进攻的军事行动，他才离开了山西。但不久之后，他又因教案而被调回山西出任冀宁道的职务。

随之而来的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使锡良的升迁突然加速。戊戌政变后不久，他出任山西按察使，旋调湖南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委托，出任勤王军统帅。在到达山西后不久，即出任山西巡抚一职。锡良认真布防，力保山西不失。此后，锡良历任河东河道总督、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颇为认真地推行新政，致力于任职省份的政治、经济、教育改革，推动了所在地的近代化的进程。如他在河东河道总督时提出裁撤河东河道总督的政治方案，在河南时创办了河南大学堂，在四川时创办了川汉铁路公司，等等。这些都表现了锡良实干家的特性。

在任职云贵总督和东三省总督期间，锡良一再出台十分激进的政治措施。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积极寻求缩短禁烟运动进程的策略。宣统二年（1910）他领衔地方督抚要求清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这些措施的出台，使锡良一时成为风云人物，成为晚清满蒙旗员中较有才干且具政治魄力之封疆大吏。他的作为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留给我们所认为的满洲权贵只会争权夺利的印象。

在抗击东三省鼠疫之后，他因病乞休。直至武昌革命兴起，他再度奉命出任热河都统。很快，清帝溥仪下诏退位。锡良也在清亡后不仕，晚年养病天津。民国六年（1917），他因病去世，年六十六，清废帝溥仪赐谥“文诚”。

由上可见，锡良是一位颇有才干与政治改革魄力的蒙古族大吏。从19世纪70年代从政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锡良目睹了一个

^① 赵尔巽编纂：《清史稿》卷449，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531页。

王朝从“中兴”走向覆亡的历史变迁。这种地方人物的存在与崛起，本身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更何况他对晚清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笔者以为对锡良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深化锡良个人的研究。目前学界虽然已有一些有关锡良的研究，但与同时代的督抚研究相比，其数量和质量仍显得薄弱，某些领域仍乏人问津，可见该人物的研究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因此，本书选择以锡良为研究对象，势必能推进该人物研究的深化。

其次，丰富和深化清末满蒙群体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于满蒙人物的研究多集中于满族人物身上，相较而言，蒙古族人物的研究则略显薄弱，这显然无法反映以满蒙联姻等关系为重要特色的清王朝的全貌。特别是在近代这一“千年变局之时代”，满蒙人物的怎样抉择显然对于揭示清王朝的覆亡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若能以锡良为切入点，势必会丰富和深化满蒙人物的研究，有助于呈现清末满蒙贵族群体的全貌。

最后，揭示清末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从而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锡良在清末政体活跃将近四十年，在各省任职，参与了众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川汉铁路、督抚联衔速立国会等，因此，若能以锡良为切入点，对这些历史事件重新研究、论述，势必会有一番新的认识。

总之，对锡良这一人物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其本人成长经历，更是可以透过锡良这一人物，理解一群人、一类人甚至一代人的所思、所想、所行。锡良研究也会丰富对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的内涵，拓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

二 研究现状

虽然学界对锡良这一人物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其他督抚，锡良的研究仍显薄弱。笔者先就目前能见到的锡良研究论著进行梳理，以期推进锡良研究的深入。

自其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锡良的研究并未有太多关注，甚至可称为空白。这一时期对锡良的关注，多为同僚或幕友的评

论,尚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曾是锡良幕府中人的沃丘仲子(即费行简)虽认为锡良做事“卞急无条理”,但这丝毫不减其对锡良的称誉,认为锡“清勤绝俗,律己甚严,粹然儒者”,“仕于晚近,未尝馈赂权要,清末一人而已”。^①赵尔巽等人纂修的《清史稿》给予锡良较高评价,认为其“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有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非义之财,一介不取;于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锡良初疏谏集权,枢廷转相钳制。及事变起,大势所趋,皆一如所言,世尤服其先见云”。^②沈曾植等人对锡良的清名亦称誉有加,认为就清廉而言,“推锡良为第一而已居第二”。^③清代御史出身的胡思敬亦称“锡良稍阔而操守尚正”^④,等等。虽然不能肯定其确为廉洁,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锡良的具有相对“廉洁”的政治品格。此一阶段,也有一些史学论著开始涉及锡良,如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述及锡良在镇压河口起义及参与立宪活动的事迹。^⑤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言论大多关注于其在官场的道德品质、为人处世的态度和相关历史事实的叙述,尚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到了50年代以后,随着《锡良奏稿:遗稿》等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学界对锡良这一人物有了系统的研究,如美国学者 Roger V. Des Forges (中文名为戴福士)就以锡良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博士论文 *Hsi-liang: A Portrait of a Late Ch'ing Patriot* (Yale University, Ph. D., 1971),后来整理出版,更名为 *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到了80年代,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锡良研究日渐受到人们重视。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锡良的研究有论文十余篇,专著一部,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通论研究、新政改革实践和其他。

①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官僚·锡良”条,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55页。

② 赵尔巽编纂:《清史稿》卷449,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535、12543页。

③ 罗继祖:《枫窗三录》,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7页。

④ 胡思敬:《退庐全集·笺牍·奏疏》,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44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278页。

⑤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版,第143—144页。

(一) 通论研究

美国学者 Roger V. Des Forges 的 *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一书是目前锡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详细考察了锡良的一生,尤其关注于锡良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该书由“升迁之路”、“在华北的抵抗”、“在四川的扩张”、“在云南的激进主义”、“在东三省的解体和倒台”五部分组成,从反外国主义和保全主权的角度出发,展现了锡良为抵抗外国侵略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改革,力图从中寻找锡良思想的传统根源。^① 沈自敏先生对该书的观点作如此评价:“论定锡良之为爱国主义和革命激进派,引起不少争论,但是此书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方面对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② 虽然如此,该书过多关注于锡良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难免会忽视源于中国内在因素的作用,出现“西方中心”的影子。并且,抵抗政策只是锡良所推行新政措施的一方面,并非其全部。此外,该书较多征引了西方人士的游记和西方政府的档案,而对中文材料的引用相较略少,因此,对锡良的评价不免带有某种西方人的偏见。

戴其芳、张瑞萍《论锡良》一文,虽认为锡良为干练、廉洁、负责且具有较强的主权观的官吏,并对其以强化边防为旨归的政策措施进行了论述,肯定了锡良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巩固边防作出的贡献,但对锡良的政治态度,如镇压革命起义和对清廷的愚忠等行为,进行了批评。^③

杜春和则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存的锡良档案材料撰写了《锡良》一文,对锡良的人生轨迹和主要政绩进行了叙述。^④

胡秋菊的硕士论文《锡良地方施政举措及其得失,1903—1911》对锡良主政四川、云贵及东北三个时期的政治措施进行了梳理,分别探析了锡良在各个时期的施政思路和施政特点,并对锡良的政策得失进行了

① Roger V. Des Forges, *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② 沈自敏:《近二十年来欧美的辛亥革命研究》,《读书》1981年第10期。

③ 戴其芳、张瑞萍:《论锡良》,《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④ 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第七卷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53页。